《蒙古王公表传》纂修再考
——第一部《表传》由何种文字写成

宝日吉根

《蒙古王公表传》是《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的通称，一般写作《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简称《蒙古王公表传》或《王公表传》。蒙文译文转写作 J̌arliɣ－iyartoɣtaɣaɣsan ɣadaradu mongɣol－yin qotong ayimaɣ－un wang güng－üd－ün iledkelšastir。简称 iled kel sastir，即《表传》。《王公表传》成书于18世纪下半叶，正值清朝乾隆末年。书成，国内学者有翻译、有研究；稍后晚些有不少外国学者对《王公表传》很感兴趣，从不同角度对《表传》进行翻译、注释和研究。本文仅就外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第一部《王公表传》究竟是由何种文字写成的问题，再谈笔者拙见①，祈望学者同仁指正。

一、外国学者研究《王公表传》。外国学者研究《王公表传》时间上有早有晚，内容是多样的，侧重点亦不相同，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不同目的出发，对该书进行了研究。为了探讨《王公表传》最早的刻本究竟是由何种文字写成这一问题，不妨将外国学者对此书研究的一般情况作一介绍，以便从中了解他们对第一部《王公表传》成书于何种文字的看法。

在研究《王公表传》的外国学者中，俄国人是较早的。据笔者所知俄国学者 A·波兹德涅耶夫是西方学者中具体接触和探讨《蒙古王公表传》的第一人。1883年波兹德涅耶夫在圣彼得堡发表《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一文②，百余年来，不少外国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王公表传》，有专题论述，亦有一般介绍，现举例如下：

1. 一般性介绍或引用。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以辞书、或工具书、或书目介绍等形式，专门介绍了《王公表传》，有1936年平凡社出版的《史籍题解》，1938年平凡社的《东洋历史大辞典》，以及1960年平凡社的《东洋史料集成》。70年代，有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③。进入80年代有日本若松宽在《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第4卷：《内陆亚细亚·西亚细亚》一节中，专门以史料介绍的形式，对《王公表传》的编修及其续纂《表传》作了评介①。

2. 在通史著作或专著中予以介绍。1966年，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⑤，该书第三章主要是从蒙古的历史、文化著作及其成就等方面向读者作了评介。另一位学者沙·毕拉，在他的《蒙古史学史》一书中，认为《王公表传》是"一部著名的蒙古、卫拉特、突厥王公履历表汇编"⑥。苏联学者Б·符拉基米尔佐夫从研究蒙古社会制度的高度评介了三种文字写成的《王公表传》，他在《蒙古社会制度史》这部专著中，把蒙文《王公表传》称作《伊勒特克勒·沙斯第尔》(iled kel šastir)，即汉意《表传》。他说：这部《表传》"对16－17世纪蒙古情况的研究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⑦

3. 利用《表传》对蒙古史特别是西蒙古史进行深入研究。有成就者当属法国著名汉学家

伯希和。伯希和著有《卡尔梅克史评注》(以下简称《评注》)⑧，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比较详细探讨和考证了西蒙古人，主要是青海厄鲁特蒙古和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及其王公世系。书中“卡尔梅克人名称考”一节，正文35页，注释有26页。在注释中专题介绍和评价了《王公表传》，字数（按：指汉译文）长达1200余字。正确指出《王公表传》的“初稿”或“原著”不是由蒙文撰写的，并对殿本《表传》及其各部续纂《表传》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评注》一书，对第一部《王公表传》由何种文字写成这一问题发表了作者的意见（详见下文)。伯希和在《青海厄鲁特部总传》一节中指出：“为了帮助了解这些近代的卫拉特人或准噶尔人，我认为应该翻译有关青海厄鲁特人或准噶人传的第一部分，原载1779－1795年那卷帙浩繁的文献汇编《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又说：“我是根据汉文本而译出，同时也与相对应的蒙古文本进行了对照比较”⑨。《青海厄鲁特部总传》原载《王公表传》卷81，《传》第65。笔者将伯希和引文与殿本《表传》（汉文本）对照，发现引文在“青海厄鲁特部，在西宁边外”一句之后，省略301字，伯希和对此删节附有说明⑩。引文内容主要是记述了青海厄鲁特部各旗统治者的世系，与殿本《表传》是一致的，其中仅有四处脱文或不当之处⑪。

《评注》的《土尔扈特部总传》一节，引自《王公表传》卷101的一部分。引文内容主要是记述土尔扈特部统治者的世系，以及该部与清朝的关系。同时又“以［按：《王公表传》］第102和103卷中的一些主要传记资料作以补充”⑫。引文与殿本《表传》内容基本一致。译文个别汉字印刷有误⑬。

伯希和在研究卫拉特蒙古史，即他本人所称卡尔梅克史，特别是其中的准噶尔、和硕特和土尔扈特部落时，以其通晓蒙汉文的卓越学识，充分利用了《王公表传》⑭。此外，在“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世系”和“土尔扈特人于1771年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两节中，多次利用《王公表传》进行分析考证⑮。大体上说，引文基本正确，考证颇有见地⑯。

4. 发表论文、专著对《王公表传》进行专题研究。这一工作约始于本世纪80年代。东方、西方学者有德国弗洛尼卡·法伊特⑰、日本宫胁淳子⑱、苏联桑奇罗夫⑲等。法伊特博士研究《王公表传》的主要成果是《喀尔喀四汗——根据1795年传记书册“表传”，论康熙至乾隆间（1661－1796）喀尔喀贵族统治的政治意义的认识》，分两卷出版，第一卷是研究篇，载有喀尔喀蒙古四部王公及清朝大臣等700余人。第二卷是蒙文《王公表传》卷45至卷76的德译蒙，附有人名、称号、地名、部落索引。此书为学者研究喀尔喀蒙古所属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和赛因诺颜部的历史、人物和喀尔喀蒙古与清朝的关系提供了很大方便。

日本学者宫胁淳子对《王公表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就《表传》由何种文字成书问题发表了作者的见解。她的《祁韵士纂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考》一文是1987年和1989年两篇研究论文的综合论述⑳。《“表传”考》分三部分：一是《王公表传》的各种版本；二是纂修官祁韵士的生平；三是文章结束语。第一部分介绍了《王公表传》的3种版本：《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本、《四库全书》本和殿本。正确指出《四库全书》本是汉文本，并准确无误列出《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本所缺少的13卷。同时对《表传》续纂次数发表了见解。第二部分是以祁韵士自订《鹤皋年谱》为依据，介绍了祁韵士的生平简历，并将《年谱》中“与《表传》纂修有直接关系的记载，已尽行引证”㉑。第三部分“结语”中，对《表传》由何种文字首先撰写而成这一问题发表了意见，指出“《表传》实际上是在国史馆首先以满文与汉文并行编纂”的㉒。

二、关于《王公表传》首先成书于何种文字。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据笔者所知有以下三种意见：一是《王公表传》"初版"或"稿本"是用蒙文写成的，简称"蒙文说"㉓；二是《王公表传》的第一稿有可能是用汉文和满文写成，简称"汉满文说"；三是笔者拙见，认为《王公表传》最早的本子是用汉文写成，简称"汉文说"。

《王公表传》首先成书于蒙文，此说最早由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提出。1883年在圣彼得堡发表了他研究《宝贝念珠》㉔的作品：《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㉕，原文和译文笔者尚未见到。伯希和在《卡尔梅克史评注》中指出"波兹德涅耶夫先生曾假定认为这部合集本著作［笔者按：即《王公表传》］的稿本是于1779年间用蒙古文在蒙古地区写成的，然后又在北京对全部著作进行了修定和补编。"㉖宫胁淳子也指出波兹德涅耶夫的"蒙文说"㉗，同时又补充说："波兹德涅耶夫所持《表传》最初是用蒙古语编纂之说，现在仍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通行见解。主要根据蒙文本对本书进行研究的西德波恩大学海西希学派，也一向采用这一见解"㉘，由蒙古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合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史》即是一例㉙。

第一部《表传》成书于蒙文之说难以成立，其理由如下：第一，祁韵士自订《鹤皋年谱》：乾隆五十四年（1789）"兹书［按：《王公表传》］既成，循例开单请叙，总裁阿文成公（阿桂）、嵇文恭公（嵇璜）、彭文勤公（彭元瑞）皆允代奏，独和相珅不肯，以蒙古字未译为词，余［按：祁韵士］言蒙古字乃理藩院续办之事，非史馆所能越俎"㉚。《年谱》记载说明当汉字本《四库》本《王公表传》完竣时，蒙文本尚未进行翻译；笔者至今也未见到有蒙文本《四库》本《王公表传》。第二，《四库》本《表传》完竣后，有多次续修，从续纂《表传》的档案资料上也可证明《王公表传》不是先用蒙文写成。国史馆在续修《表传》时，一般要求将少数民族文字 的资料或原文上报，或将少数民族文字汉译送达国史馆，编写过程中发生人名、地名歧异时，要核查原文㉛。例如，喀尔喀蒙古四部报送理藩院的蒙文王公事迹，国史馆在编写《王公表传》时，要求"应译汉，先行移送国史馆"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国史馆档案：道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蒙古表传处移文国史馆："查此项书籍［按：《王公表传》］应由本处先行纂辑汉文《表传》，进呈后，然后翻译清文，清汉完竣，移贵处翻译"㉝。道光十三年八月二日又有一件"蒙古表传处移付国史馆"文，要求速纂《表传》，以便翻译蒙文㉞。历次纂辑《表传》都是如此。

伯希和在《评注》中对《表传》先以蒙文成书一说，指出：我没有发现可以支持这种理论的任何论据"，"我认为更可能是当时在北京使用了由理藩院所搜集的具有各种来源的文献。［《王公表传》］其第一稿……不是用蒙文所撰"㉟。所言极是。

《四库》本《王公表传》是第一部完竣的《王公表传》，且是汉字本。这部《表传》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成书之前，经历一番编纂过程，即一边编写，一边"陆续进呈"㊱，直至五十三年告竣。其间至乾隆四十七年，《王公表传》才进呈4卷，已编写尚未进呈的约有28卷，合计不过30余卷㊲。于是乾隆帝下令限期于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完竣，至四十九年仍未完竣，因故准予宽延限期㉘。乾隆五十年二月，军机大臣查核《表传》编纂工作时，国史馆表示可在当年四月完成。此前于乾隆四十八年皇帝下令：将所有现办满汉臣工表传及《宗室王公表传》、蒙古王公事迹，在乾隆四十年以前的军机处所存档案，发交国史馆，令总裁官率领纂修各官"速为纂办，勒限五年"㊴，"陆续进呈，候朕钦定，成书颁行"㊵。《表传》几经延迟，终于在乾隆五十三年成书，并录入《四库》。次年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已将《王公表传》的"四库"文津阁本"总目提要"写毕，并经

总校官陆费墀校阅㊶。

如前所述，外国学者在评介和考察《王公表传》版本时，为什么会出现《表传》的“初稿”、“原稿”㊷、“第一稿”的不同说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王公表传》最早是由何种文字写成的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下边讨论这一问题。

伯希和《评注》：所指《王公表传》的“初稿”、“原著”和“第一稿”，似与李桓所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以下简称《耆献类征》）有密切关系。伯希和称《耆献类征》是一部“大合集著作”㊸，即中国学者一般所指的史部传记类图书。李氏《耆献类征》有光绪间湘阴李氏刊本，收入自后金天命元年（1616）至道光三十年（1850）间清代列朝人物传志，并以“宗亲藩部王公勋业最盛”为由，将《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和《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其续纂各部《表传》“经文纬武，明备允昭，谨将全书冠之简首”㊹。《王公表传》（殿本）载《耆献类征》卷首13至卷首132，“总目”中书名作《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书口处书名作《外藩传》㊺。卷首133至卷首204是《王公表传》的几部续纂《表传》。《王公表传》及其各篇续纂《表传》，在《耆献类征》“总目”中书名依次作《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殿本）、《钦定续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嘉庆十七年、道光十六年、道光二十九年三次续修，书名均相同）。书口处书名依次是《外藩传》（殿本）、《外藩初续传》（嘉庆十七年）、《外藩再续传》（道光十六年）、《外藩三续传》（道光二十九年）。书口处这一书名的出现，便由此产生了《王公表传》的续纂本的“初续”、“再续”、“三续”之说，这一说法还影响到中外学者，他们在研究和利用《王公表传》时，普遍采纳了李桓之说。

伯希和《评注》：清朝“在1779—1795年用汉文、蒙古文和满文三种文字编纂了《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㊻，这是一段正文。在此正文的注释中又指出“这套文集本［按：即《王公表传》］是根据乾隆皇帝的旨令于1779年编纂的。初稿于1788年呈奏御案，然后又对汉文、蒙文和满文3种内容相同的文本进行了整理，全部工作于1795年完成，于是当时便在武英殿刊印。”㊼正文内容表明三种文字的《表传》是在1779—1795年之间完成的。从注释内容看，初稿完成于1788年，这似乎是《四库》本《表传》，但从下文看，三种文字“文本”经过“整理”“全部工作是1795年完成”的，如此看来，1795年完成的不是《四库》本《表传》，而正是《四库》本《表传》的第一次续修本即“殿本”《表传》。从1788年完成的“初稿”，到1795年经过“整理”而成的“文本”，其“整理”步骤如何？初稿是以何种文字写成的？伯氏似乎未说清楚。《王公表传》是1779年乾隆帝下令敕撰，1788年完竣，这是第一部《表传》，即《四库》本《表传》，1788年“呈奏御案”的文本当是此《四库》本，内容至乾隆五十三年，此本经过第一次续纂而成三种文字本，即伯氏所云1795年完成的“文本”。所谓1779—1795年编纂的《表传》不仅仅是一部《王公表传》，而是两部《表传》。1779年敕撰，1788年完竣的是汉字本《表传》，并录入《四库》；1788年完竣之后，接续而成的是1795年成书的“殿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国史馆档：《王公表传》“至［乾隆］五十三年告竣，随接办三体画一《表传》于六十年完竣，后另缮样本各一分，交武英殿刊刻刷印”㊽。档案记载充分证明乾隆五十三年成书的《表传》是汉字本，即以汉字录入《四库全书》的《王公表传》㊾。这里所说“接办三体画一表传”，是指对《四库》本《表传》的“接办”，且是“三体画一”。《四库》本是第一部成书《表传》，那么，所“接办”的“三体画一”《表传》即是第一次续纂《表传》，即通常所说的“殿本”《王公表传》，成书时间是乾隆六十年（1795），内容截止亦是乾隆六十年，比《四库》本《表传》多七年的记载。这部《表传》即是伯希和

所说的经过“整理”“全部工作于1795年完成”的“文本”。《评注》还提到《王公表传》“原著与第一次续纂都用3种语言在武英殿刻印”㊿。这里所说“原著”是指“初稿”本？或是“殿本”？如果“原著”是指“初稿”本，那么初稿本即是用3种文字书写的；若“原著”是指“殿本”，似有几分道理。以“原著”之后与“第一次续纂”相连推测，伯氏的“原著”当指“殿本”。众所周知，殿本是用三种文字撰写的，而伯氏所说“第一次续纂”是指嘉庆间续纂本51。《评注》：《王公表传》在“1802年［嘉庆七年］52间，嘉庆诏令编纂第一部续传”53，“第一部续传”即上文所指的“第一次续纂”。无论是第一部续传或是第一次续纂，都是沿用《耆献类征》中的“外藩初续传”。由此看来，把嘉庆续纂本当作第一次续修，此前的“殿本”便成了“原著”或“初稿”了。

类似伯希和的例子，还有日本若松宽的《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和宫胁淳子的《“表传”考》等都把《王公表传》的续纂分为初续、再续和三续，或称三次续纂本，其来源概是《耆献类征》。

据笔者目前所见档案，第一部《王公表传》成书后有如下六次续修：

1.《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通常所称“殿本”《表传》，120卷，汉、满、蒙三体画一。乾隆60年完竣，“后另缮样本各一分，交武英殿刊刻刷印，共三百六十卷，一百八十本，装潢成帙，恭呈御览”55。乾隆帝批准后，经过修改、校对，总裁阅定，刷印三体画一“正本”，全部工作完成于嘉庆七年（1802）七月56。内容至乾隆六十年。

2.《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嘉庆十七（1812）年敕撰，三体画一，每部24卷，十九年完竣，内容至嘉庆十六年57。

3.《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道光十六（1836）年敕撰，三体画一，每部24卷，十九年完竣，内容至道光十年58。

4.《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道光二十九（1849）年敕撰，三体画一，每部24卷，咸丰元年完竣，内容至道光二十五年59。

5.《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咸丰九年（1859）敕撰，三体画一，每部24卷，同治九年（1870）完竣，内容至咸丰五年60。

6.《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61。这部《表传》虽有敕撰年月日（光绪十年十二月十八日）62，但从目前笔者所见“国史馆档”中，尚未见到《表传》的长编、稿本或底册等资料。直至宣统三年闰六月63，这部续纂《表传》或是未正式开馆编写，或是还没有完竣，有关该部《表传》的档案，包括家谱档册、王公源流、升迁调补等，至今发现甚少，也可能还在大陆或台北所收藏的“国史馆档”或其他档案中，还望有识之士赐教。

考察了《王公表传》的最早汉字本及各种续纂本之后，再来讨论《表传》的“汉满文说”。伯希和认为《王公表传》“第一稿无论如何也有可能是用汉文和满文写成”64，此说表明《表传》“第一稿”不是以一种文字写成，而是以两种文字（汉、满文）同时撰写而成。笔者至今尚未发现和见到《四库》本《表传》的满文本及其满文本的任何书目。“国史馆档”中也未发现第一部《表传》是以汉满文同时撰写的任何资料，相反却有续纂《表传》的撰写是由汉译满，再从满译蒙的记载。65

祁韵士“谙习清文”66，为编纂《王公表传》查阅了大量内阁大库所藏满文资料，“凡有关于外藩事迹者，概为检出，以次覆阅详校，择其紧要节目，随阅随译，荟萃存作底册”67。为了准确了解西北一带山川疆域，又根据《皇舆全图》“译出山水地名”68，李兆洛为《藩部

要略》写序时指出：祁韵士“为蒙古回部诸王公列传，皆内检黄册，外译舌人”⑱。

祁韵士之子祁寯藻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为其父《藩部要略》写跋文：“先大夫既成《表传》一百十二卷⑳，进呈御览，为今著录《四库》之《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㉑。祁寯藻所言《表传》卷数虽与《四库》本有别，实即指现存《四库》本《表传》，是确凿无疑的。

祁韵士精通满汉文，充分利用蒙译汉和满译汉的资料，用汉文撰写了第一部《王公表传》，即祁寯藻所说“为今著录《四库》之《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

①⑳拙文《蒙古王公表传纂修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②⑱㉕㉘A·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宝贝念珠”—包括1636—1736年喀尔喀史料》圣彼得堡，1883年。转引宫胁淳子《祁韵士纂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考》，载《东方学》第81辑，平成三年（1991）1月，以下简称《“表传”考》。宫胁淳子惠赠此文，谨致谢意。

③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④《亚细亚历史研究入门》卷4，株式会社同朋舍出版，1984年。

⑤蒙古科学院历史所《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1966年。1986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由新蒙文改写出版。

⑥毕拉《蒙古史学史》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⑦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⑧⑨㉖㉟㊷㊸㊻㊼㊿51 54 64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耿升译，中华书局，1994年5月。参见第25、49、50、88页。

⑩删节内容是青海厄鲁特部至京师道里、厄鲁特四至八到。伯希和说：“我于此略去了——列举这块领土的一段文字，因为它对于本文所涉及到的问题没有多大价值。”此说是。

⑪“三旗祖”、“一旗祖”，误为“三旗主”、“一旗主”。译文断句，个别之处有误。着重点是笔者所加，下同。参见殿本《表传》卷81。

⑫⑭⑮⑯引用《表传》卷79、82、85、87、88、90、100、101、102、103。参见《评注》第88、92、95、96、105、109、147页。

⑬“将抵玛努托海”讹为“特抵玛努托海”；“言语不同之区也”，讹为“言语不同之匿也”。参见《王公表传》卷101。

⑰1981年《喀尔喀四汗关于康熙至乾隆间（1661—1796）喀尔喀贵族统治政治意义的研究》、1983年《作为蒙古史研究史料的1795年版“蒙古回部王公表传”》、1990年德国威斯巴登奥托·哈尔索维茨出版社《喀尔喀四汗—根据1795年传记书册“表传”，论康熙至乾隆间（1661—1796）喀尔喀贵族统治的政治意义的认识》。参见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博士惠赠法伊特著作目录，并帮助翻译，谨此致谢。

⑲桑奇罗夫论文：《“王公表传”是卫拉特史》(1984)、《论“王公表传”的史料来源》(1986)。两篇论文仅见篇名，收入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蒙古学部编《蒙古学资料工作》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⑳《新近发现的武英殿版“蒙古王公表传”中文本》(1987)、《18世纪的汉人阿尔泰学者祁韵士》(1989)。

㉑㉒㉓㉗宫胁淳子《“表传”考》；伯希和《评注》第50页。

㉔《宝贝念珠》作者伊希巴勒丹，成书于1835年。

㉙蒙古科学院、苏联科学院合编《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乌兰巴托，1955年。

㉚《鹤皋年谱》载《山右丛书初编·万里行程记附》。

㉛㉜㉝㊱㊽㊺㊾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第一档案馆）$\frac{534}{11-1}$ 371号、372号、373号、762号。

㉞第一档案馆：“蒙古表传处为移付事，查自嘉庆十六年起至道光十年止，各蒙古王公等袭替恩赏事迹，前由理藩院造册送馆，经本处于道光十一年七月及十二年十一月两次移送贵馆，纂办在案，今如纂竣，希即移

回本处，以便翻译蒙文可也。须至移付者。右移付前馆。道光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参见$\frac{534}{11-1}$371号。

㊲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乾隆47年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奏折及后附“各馆现办各书酌定完竣日期清单”，转引自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

㊴㊵《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051。

㊶北京图书馆藏文津阁本《四库》本《王公表传》。

㊹《耆献类征》李桓序文。

㊺见《耆献类征》卷首204书口处书名。

㊾敕撰《王公表传》谕旨见《清高宗实录》卷1088；文渊阁、文津阁《四库》本《表传》；殿本《表传》。《高宗实录》作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壬子（1779年9月10日）；文渊阁本《表传》等时间相同。均作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1779年9月9日）。

(52)(53)嘉庆七年（1802）敕撰的并非“第一部续传”；1802年完竣的是指截止乾隆60年的殿本《表传》的刷印完竣之工作。参见第一档案馆$\frac{534}{11-1}$373号。

(54)伯希和用1200余字对《王公表传》作注释，其中提到《表传》“初稿”、“第一稿”各一次，用“原著”一词5次，其中列举《耆献类征》所收《表征》“原著”，尚缺《表》和《传》共13卷。此处“原著”确指殿本《表传》。参见《评注》第49—50页。

(57)总裁大学士庆桂、董诰、刘权之，总裁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松筠、副总裁户部侍郎觉罗桂芳等奉敕撰。

(58)潘世恩、穆彰阿、汤金钊、赛尚阿等奉敕撰。伯希和《评注》书名作《钦定再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不确切。

(59)穆彰阿、潘世恩、赛尚阿、侯桐等奉敕撰。伯希和《评注》书名作《钦定三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不确切。

(60)彭蕴章、穆荫、爱倭、杨式毅等奉敕撰。

(61)光绪朝本《表传》未见原书。据《清德宗实录》卷175，光绪九年十二月庚戌条作《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62)《清德宗实录》卷175，光绪九年十二月庚戌条记载，续纂《表传》敕撰时间与“国史馆档”有别，特记于此，容当另考。

(65)第一档案馆$\frac{534}{11-1}$373号：道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蒙古王公表传处移付国史馆文”：蒙古王公表传处为移付事，准前馆付称准蒙古处付称，如《蒙古王公表传》纂竣，希即移回本处翻译蒙文等因前来，查此项书籍应由本处先行纂辑汉文《表传》，进呈后，然后翻译满文，清汉完竣，移贵处翻译，今本处赶办汉本，……查此项书籍，自乾隆六十年纂办三体画一《表传》，及嘉庆七年刊印完竣，皆系满洲、蒙古、汉字三体，一并进呈。又嘉庆十九年续纂《表传》，……亦系满洲、蒙古、汉字三体，一并进呈各在案。此次纂辑《表传》，自应查照历届办理，贵馆如有纂妥卷帙，务希陆续移交本处翻译蒙文，以便一并进呈。又可参见$\frac{534}{11-1}$373号：道光十四年九月二日“蒙古王公表传处移付国史馆文”；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九日“蒙古馆移付国史馆文”；咸丰二年七月二日“蒙古处移付国史馆文”。

(66)(67)(68)《鹤皋年谱》。

(69)《藩部要略》李兆洛序文，见道光26年筠渌山房刊本。《藩部要略》与《王公表传》史料来源均出自内阁大库和理藩院所藏满蒙汉文档案和王公家谱档册。参见拙文《蒙古王公表传纂修考》和《“皇朝藩部要略”张穆改定稿本评介》，载《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

(71)《藩部要略》卷18。